

第五辑

医疗卫生与现代社会

医疗社会史研究

Journal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Vol. III, No.1, June 2018



主编 张勇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医疗社会史研究

Journal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Vol. III, No.1, June 2018

第五辑

主 编 张勇安

特约主编 刘招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18 年. 第五辑 / 张勇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203 - 2819 - 7

I. ①医… II. ①张… III. ①医学社会学—社会史学—
丛刊 IV. ①R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106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文一鸥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2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6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委员会

David Courtwright	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	陈 勇	武汉大学
John Warner	Yale University	李建民	台湾“中央研究院”
Margaret Humphreys	Duke University	梁其姿	香港大学
Sanjoy Bhattacharya	University of York	陶飞亚	上海大学
Virginia Berridge	University of London	张大庆	北京大学

编 委

Iris Borowy	上海大学	李乃适	北京协和医院
James Mills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李玉尚	上海交通大学
饭岛涉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	刘士永	台湾“中央研究院”
陈丽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	杨 震	中山医院
陈 明	北京大学	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
高 晞	复旦大学	余新忠	南开大学
胡 成	南京大学	张勇安	上海大学
李传斌	湖南师范大学	张仲民	复旦大学
李化成	陕西师范大学	朱建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

ADVISORY BOARD (in alphabetical order)

- Chen Yong *Wuhan University*
David Courtwright *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
John Warner *Yale University*
Li Jianmin *Academia Sinica*
Angela K. C. Leu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garet Humphreys *Duke University*
Sanjoy Bhattacharya *University of York*
Tao Feiya *Shanghai University*
Virginia Berridge *University of London*
Zhang Daqing *Peking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in alphabetical order)

- Chen Liy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 Ming *Peking University*
Gao Xi *Fudan University*
Hu Cheng *Nanjing University*
Iijima Wataru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Iris Borowy *Shanghai University*
James Mills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Li Chuanbi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Li Huache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 Naish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Li Yus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u Shiyung *Academia Sinica*
Yang Zhen *Zhongshan Hospital*
Yu Gengzh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Yu Xinzong *Nankai University*
Zhang Yong'an *Shanghai University*
Zhang Zhongmin *Fudan University*
Zhu Jianping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目 录

专题:医疗卫生与现代世界

专题论文

003 弗吉尼亚·贝里奇

瘾品的新认知、新政策与新行动

——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

021 托马斯·理查德·戴维斯

未讲述的“国际卫生组织起源”故事:救援协会、国际网络与个体角色

037 朱莉娅·弗雷扎 马罗·卡波契

国际卫生组织与全球流行病学:拉马其尼学院的发展历程

055 李 晶

拯救城市的未来:进步运动时期纽约市儿童卫生改革

075 刘榕榕

地中海首次鼠疫与拜占庭帝国医疗事业的嬗变

088 刘黛军

疫、人共防:1900年美国海军医院管理总署与鼠疫管控

105 刘雨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础医疗改革进程
及其影响(1996—2004年)

学术演讲

129 马克·哈里森

印度的疟疾、人口与发展(1860—1947年)

前沿工作坊

157 刘士永 张仲民 柴彬 杨雄威

医疗社会史研究:新议题、新路径和新方法

学术书评

199 朱联璧

旧酒如何装新瓶?

——谈《蚊子帝国: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
(1620—1914)》的史料运用

213 万澍

医疗史还是身心障碍史?

——评《战争之费:康复治疗与一战中的美国》

目 录

226 CONTENTS & ABSTRACTS

232 注释凡例

235 稿约



专题论文



瘾品的新认知、新政策与新行动

——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

[英] 弗吉尼亚·贝里奇著 黄 运译

摘 要 本文认为关于酒精、烟草和毒品的政策分野开始于 19 世纪。促成分野的原因并非因为这三类物质本身有别，而是缘于科技进步和医药市场的发展、专业理论的建立、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运动、公共卫生、对“他者”的恐慌以及国际乃至全球对这些瘾品的关注。这种分野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促成了后来针对毒品的国际管控，可是这种国际管控并没有落在酒精和烟草之上。酒精和烟草后来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文化，而毒品消费却被归类到一种次文化之中。本文认为，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上述诸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把这些瘾品置于同一个政策框架内。当前呼吁制定“合理的”瘾品政策的言论所忽视的是，瘾品政策本身是历史地形成与变化的。

关键词 瘾品 瘾品政策 国际管控 次文化 公共卫生

历史学家惯于回顾过去，本文将对未来做些展望。

当我们被要求预测未来时，我们得事先声明：我们可以对历史进行分析，却不是预测未来。

然而几年前，参与英国政府项目“预见计划”（Foresight initiative）的经历帮助我克服了这种不情愿的态度。英国政府希望借此研究项目“展望”未来 20—25 年的政策和科学。我们负责项目中精神活性物质这一部分，后来历史学家蒂姆·希克曼（Tim Hickman）和我撰写了其中关于历

史的部分。^① 运作该项目的公务员们对未来满怀信心。他们委任亨利智库中心对20年后的未来做了四项展望,然后请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来推测哪些事件将会引起那些他们做出的展望。我当时并没有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因为我并没有对他们的展望做更多的思考,但我还是大胆地给了一些建议。例如,我向他们建言: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夫人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将会是毒品合法化行动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我的建言并没有被采纳,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这样的建议写进官方报告并不太合适。然而,这一事件促使我思考:历史学家可以为预测未来做点什么贡献呢?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来撰写那些展望呢?在近些年来的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为政策的制定做了贡献,他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②

促使我写作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因素。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学院在2013年召开了一次纪念葛里菲兹·爱德华兹(Griffith Edwards)教授的会议。爱德华兹教授当年和我合著了《鸦片与人民: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鸦片制剂的使用及政策》,他也是我进入毒品研究领域的领路人。^③ 爱德华兹教授于2012年辞世。2013年的那次会议召集了当年曾和爱德华教授一起在成瘾研究所[Addiction Research Unit,即现在的国家成瘾研究中心(National Addiction Centre)]工作的人们。该研究所隶属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位于伦敦坎伯威尔区丹麦山。那次会议的内容颇为有趣,因为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涉及毒品、酒精和烟草三个领域。这也正是成瘾研究所的传统。该所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到了70年代,将这几类瘾品(毒品、酒精和烟草)置于一个共同的宽泛范式之内的做

① Virginia Berridge and Timothy Alton Hickman,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in D Nutt, et al., *Drugs and the Future: Brain Science, Addic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lsevier, 2006. http://www.foresight.gov.uk/Brain_Science_Addiction_and_Drugs/814_bb.html.

② V Berridge, "History Matters? History's Role in Health Policy Making," *Medical History*, Vol. 52, No. 3 (2008), pp. 311-326.

③ Virginia Berridge and Griffith Edwards, *Opium and the People: Opiate Us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法已变得可能。^①

这就是我写作本文的缘起。当前，我们又到了对这些瘾品重新进行定义的时刻，英国如此，欧洲也如此，不过在其他地方，这种必要性可能要弱一些。作为一名英国历史学家，我想发问的是：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过程？这些新认识和新关系适用于将来吗？这也正是我的新著《魔鬼：我们对酒精、烟草和毒品持续变动的态度》一书的研究主旨。我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从19世纪至当下的毒品、酒精和烟草问题。在下文，我将综述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以及我近期的一些思考。^②

一 分野

酒精、烟草和毒品的历史在19世纪发生分野。在这一时期，所有的瘾品——毒品、酒精和烟草从文化意义上讲都具备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在英格兰和其他西方国家，当时的人们可以在酒馆里买到酒精，在街角小店里买到鸦片，在柜台买到那种用陶土管吸食的烟草。到20世纪初期，它们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购买酒精和烟草是合法的，而购买鸦片剂和相关的毒品如可卡因和大麻则是非法的。这种结果一方面源自管控，另一方面是因为瘾品的分类。20世纪初期是一个转折点。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毒品和酒精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时期见证了关于烟草的大众文化的发展，随后是酒精（当然，具体情况在各个国家有别，而20世纪30年代以前则还有美国禁酒运动的影响）和非法毒品次文化的发展。此处讨论的问题在各个国家具体而言又有区别，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模式。

本文并不准备对此过程加以详述。概言之，工业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与社会运动相互作用。企业群体的利益是重要的。与此同时，医学和药学的职业化以及医学训练和管理体系的引入，使一些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

^① Virginia Berridge, "Histor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Addiction and Society," *Addiction*, Vol. 110, No. S2 (July 1, 2015), pp. 23–26.

^② Virginia Berridge, *Demons: Our Changing Attitudes to Alcohol, Tobacco, and Drugs*, 1st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管控，或者至少加强了管控的意愿。公共卫生情况也推进了这一变化。公共卫生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方面与医学群体的职业化进程相关，另一方面与社会有关联，还有就是它并不完全是“利他”的。社会恐慌在这一过程中也推波助澜。如果某一瘾品和某一让人恐惧的或者被鄙视的少数人群联系起来，那么针对这一瘾品的严厉政策就很容易出台。最后，国际和全球舞台是某些瘾品管控政策产生的地方。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述这些因素的作用要么将某一类瘾品从主流中分离出来，要么将其更深入地嵌入主流之中。^①

不同瘾品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随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大众媒体上的广告大肆赞美烟草，甚或使用医生对烟草的健康功效所做的肯定；另一方面，“瘾君子”（junkie）一词开始成为媒体对毒品使用者的一般性表述。

但是自此之后，形势又有大变。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本文重点关注的也正是这一时期对于新概念的产生和界限的变化意义。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瘾品，即便是那些合法的瘾品，也分别被归入不同的范畴并有了各自的发展走向。但即便它们被分开了，那些促使它们再度聚合的因素依然存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它们之间已有了分野：它们有的成为毒品，而有的则成为药品。20世纪初那些将它们分隔开来的因素似乎正在让它们重新聚合。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这些历史事件是如何对这些瘾品产生影响的？这些瘾品又将走向何方？

二 烟草和公共卫生的新方向

1945年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是烟草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人们对烟草的反应和对毒品与酒精的反应明显不同。疾病理论不涉及烟草，烟草也从不是某次重要的抵制运动抑或国际管控的关注点。工业和科技的改变带来了烟草的大规模生产，并

^① Virginia Berridge, *Demons: Our Changing Attitudes to Alcohol, Tobacco, and Drugs*.

形成了关于烟草消费的大众文化，与此对应的却是逐渐形成的关于毒品消费的次文化。

吸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共卫生关注长期的危害，这种长期危害是随着慢性病流行病学的新发展而被注意到的。这些新知识通过专家群体的报告转化为政策，例如英国皇家医学院 1962 年的报告和美国卫生局局长 1964 年的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政策。在英国，它关注长期危害、个人自我决定与生活习惯、消费主义与财政控制，反对工业合作以及运用大众媒体教育民众。烟草也自此开始了它与主流文化分道扬镳的漫长过程。^①

关于烟草的公共卫生政策有所不同，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一公共卫生政策开始走向毒品和酒精当年被概念化的道路。而另一方面，烟草也开始具有了毒品的某些因素。我们要考虑的四个主题是：

- 公共卫生观念从烟草渗透到毒品再到酒精领域
- “疾病观念”被应用到各类瘾品之中
- 尤其是针对毒品和烟草的“减少危害”（harm reduction）政策的兴起
- 预防性的公共卫生治疗和相关的科学

三 公共卫生观念对毒品和酒精的影响

论及公共卫生观念对毒品和酒精政策的影响，一个重要方面是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被应用到烟草的“新公共卫生”模式开始被应用到其他物质上。70 年代，该观念开始从烟草扩展到毒品再到酒精领域，而在这一时期，“公共卫生”与“初级医疗”已位居国际卫生计划的中心位置。毒品和酒精还保有它们先前被定义为“疾病”的那些要素，但是新公共卫

^① Virginia Berridge, *Marketing Health: Smoking and the Discourse of Public Health in Britain, 1945–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生模式的影响也愈加明显。作为20世纪70年代毒品和酒精精神病学模式的一部分,新的公共卫生模式也开始发挥其影响。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关于饮酒之危害的“全民”(whole population)理论的兴起;流行病学中精神病学疗法日益成为一种研究工具;此外,这些理念被应用于毒品政策。酒精和毒品都不再被视为一个精神问题。这里,我们兹以国际和英国国内三种发展情形来阐明这一变化。

首先,“紫皮书”《公共卫生视域下的酒精管控政策》的出版。该书是20世纪70年代公共卫生(精神病学)领域重要的出版物。它的出版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加拿大成瘾研究基金会的赞助。这个由精神病学家、流行病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组成的研究小组由芬兰学者凯蒂尔·布鲁恩(Ketil Bruun)领导,第一次把“全民理论”引入酒精政策,以替换原来的疾病理论。^①

其次,我们可以将这一发展和1964年布雷恩委员会(Brain Committee)使用流行病学等同视之。布雷恩委员会是英国的一个重要政策委员会,它率先意识到日益壮大的成瘾者群体所带来的影响,并将之纳入相关的政策加以应对。该委员会认为“成瘾是一种具有社会传染性的状态,它可以作为一个指标用于流行病学评估和控制”。^②

诊所被用来阻止更多的人成瘾,同时治疗那些已经成瘾的人。此处我们可以看到或新或旧的公共卫生概念(检疫和控制传染)与精神病学概念的结合。

再次,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艾滋病是如何将“公共卫生”型瘾品政策向前推进的。不过这只是在英国,而美国的情况则不太一样。鉴于毒品使用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针头交换和美沙酮治疗来减少伤害

① K. Bruun, *Alcohol Control Policies in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Ketil Bruun... [et al.];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of the Finnish Foundation for Alcohol Studi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the Addic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of Ontario, The Finnish Foundation for Alcohol Studies, Vol. 25, Helsinki; Distributors: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1975.

② Ministry of Health, “Drug Addiction: Second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London: HMSO, 1965.

的理念因此成为英国的一项政策，并被称为“公共卫生政策”。^①

四 疾病概念的转变

另外一个发展是重新调整了那些潜在失调的概念和理念。概念的转变包括关于“使用”和“有问题的使用”的新理念被应用到非法毒品上。与此同时，主要用于毒品使用的“成瘾”一词开始被用到烟草上。烟草的社会地位被改变，开始被称为毒品，而毒品本身却变得“正常化”，关于毒品使用的新理念趋向于将其视为更加“正常”的东西，而吸烟却被看作病态的现象。

关于这一变化，一个颇有意思的方面就是20世纪70年代各种瘾品被试图统辖到“依赖”（dependence）一词的名下。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它却成为20世纪末瘾品政策变化的发端。所谓“世纪末的变化”，即由成瘾研究所（Addiction Research Unite）领导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层面的工作加以巩固的趋向。70年代，“依赖”一词可以将各类瘾品统一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被应用到了所有的瘾品上。但是在当时，它还无法在概念上将所有的瘾品统一起来。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策略性因素，尤其是对“自决”（self determination）的强调、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以节制为最终目的的公共卫生政策的施行。对酒精和毒品成瘾的治疗涉及精神病学，而烟草却没有。

通过这些试图将各类瘾品从概念上加以综合的早期努力后，“成瘾”（addiction）一词最终奇迹般地将各类瘾品联合在了一起。吸烟后来也被视为一种“成瘾”现象。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对吸烟的科学理解，毋宁说这是一个“有待被发现的事实”，即它是一个科学事实，这一科学事实的含义使与烟草相关的各方力量联合起来。

众所周知的是，“成瘾”这一概念虽然“隐秘”却又为烟草公司所熟知。事实也许就是如此。公共卫生研究者也是如此，他们熟知这一概念，但是“成瘾”问题并不是当时公共卫生政策的关注核心。

^① Virginia Berridge, *AIDS in the UK: The Making of Policy, 1981 - 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